

## 布兰德社会生态转型理论述评

贾 雷

**摘 要:**生态、经济、能源等危机的并发和全球性环境治理的局限,使得“转型”成为一个当前频繁使用的术语。维也纳大学乌尔里希·布兰德教授提出的“社会生态转型”概念,意图对近些年来应对社会生态危机的战略性实践和学术性探讨做一种批判性分析。“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种分析性概念,旨在阐明当前占据世界主流地位的“绿色经济”战略正潜在地促成一种暂时性的、排他性的新型资本主义形态——“绿色资本主义”;而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政治生态学等相结合,则进一步揭示“绿色资本主义”实质上是一场并未触及破坏性根源的选择性“绿化”,而“转型”的关键在于批判与实质性变革当前复杂的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形式及其支配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

**关键词:**社会生态转型;绿色经济;绿色资本主义;批判性政治生态学

**中图分类号:**C91-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169(2016)05-0064-08

**DOI:**10.16493/j.cnki.42-1627/c.2016.05.007

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政治学系乌尔里希·布兰德(Ulrich Brand)教授提出的“社会生态转型”概念,作为一个总括性术语,并无确切或唯一的定义,在更多情况下代表着一系列有关“转型”的认知和实践的集合。它试图描述近些年来源自不同利益视角与理论立场的、试图解决社会生态危机的战略性实践与替代性思考所引发的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转变<sup>[1]</sup>。这其中,既包括由智囊团和国际组织,比如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等在旗舰报告中所提出的,在现存政治经济体制内依靠国家机关、私人企业、社会精英等的主动改革,以实现缓解环境退化与恢复经济增长的双赢或多赢局面的战略性举措,像《迈向绿色经济》、《绿色技术大改造》等,也涵盖了质疑现存利益主导性市场结构,进而挑战作为其基础的生产和消费模式、统治性社会权力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的一系列指涉社会冲突、社会与自然矛盾等的学术性思考,像政治生态学、关于“去增长”的讨论等。正如布兰德本人所言,一个概念的有效性,往往取决于其更明了地阐释社会和社会生态现象与难题的合理性和适用性。

### 一、“绿色经济”主导下的“绿色资本主义”转型

源起于金融资本过度积累的 2008 年经济危机和以化石矿物燃料为基础的资源密集型生产与消费模式所酿成的全球性环境退化,使得“(多重)危机”成为描述这个时代的一个核心性概念。一方面,由于缺少强有力的执行者,“可持续发展”在政治意愿、环境政策及其制度监管上的软弱使得“棕色

作者简介:贾雷,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1)

经济”仍占据主导地位。在过去的20年中，世界范围内资源、生态系统和污水池（Sink）<sup>①</sup>的消耗大幅上升，且随着新兴工业国的崛起，生态问题正变得愈发严重。另一方面，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国家急需找到新的经济突破口与投资领域，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利润空间。而资源稀缺、全球变暖等生态问题所衍生的碳汇市场、绿色科技、可再生能源、绿色投资等则成为潜在的商业契机。“增长”和“积累”是资本主义从未被质疑过的永恒主题。因此，一种旨在重塑经济增长的同时降低环境风险的新型经济范式——“绿色经济”应运而生。“直白地说，绿色经济可视为一种低碳、资源高效型和社会包容型经济。在绿色经济中，收入和就业的增长驱动着那些能降低碳排放及污染，增强能源和资源效率，并防止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丧失的公共及私人投资。”<sup>②</sup>

在当前关于绿色经济的广泛讨论中，对社会生态问题的诊断主要集中在以下两点：一是资源密集型的西方生产和消费模式已使得当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模式难以维系，二是市场制度并非万能，适当的政治管控（如积极的技术政策）成为必须。它们的目标和决策也极为一致：低碳经济、资源效率、绿色投资、技术革新和更加可循环、绿色工作、减少贫困以及社会融入<sup>[2]</sup>。

布兰德认为，同20年前的“可持续发展”概念类似，“绿色经济”业已被视为政治和经济上可行与合理的范式。尽管当前对绿色经济的探讨并未涉及结构上的阻力和与其相抵触的利益集团，就目前而言，生态与经济危机所催生的“绿色经济”概念下的各种战略性决策，正潜在地促成一种新型资本主义形态——“绿色资本主义”，以取代陈旧且充满危机的后福特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态<sup>[3]</sup>。

相较于生态马克思主义所认为的“绿色资本主义”是一个矛盾性概念，即资本的增殖原则和环境保护的根本性对立使得“绿色”与“资本主义”在现实中无法兼容，布兰德更加强调对抽象矛盾之外的、具体危机形式的关注。在他看来，生态马克思主义通过分析占主导地位的交换价值而过分聚焦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维系生物圈稳定的根本不相容性，很少从具体层面关注正在不断演化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以及内含于其中的表现形式各异的生态矛盾，而简单地认定管理这些复杂冲突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而相比之下，“规制理论”对于社会转型过程的研究则有着明显的优势，它对积累体制、管制模式等的具体分析，更有助于探讨不同时空、形色各异的资本主义生产模式所隐含的生态矛盾进一步恶化，或通过相应管治措施以保持暂时稳定的可能性<sup>[3]</sup>。此外，国家或政府的政治实践也将成为这个复杂管制过程中需要重点考察的部分。在这里，国家并不是一个独立于社会之上的中立实体，而是各种社会关系的凝结<sup>[4]</sup>。它必须保证“转型”过程同大多数人的生活实践相一致，如通过跨国获取原材料、区域性污染转移、基础设施建设等手段，使人们既有的生活习惯和消费需求在国家和国际层面得到保证。此外，唯物主义国家理论和葛兰西霸权主义理论的引入，则可以使人们对经济发展之外的、起到补充性作用的社会和政治功能有着清晰的认知。

因此，“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种分析性框架或概念，对“绿色资本主义”的描述不仅仅是对资本与自然这一根本性矛盾的阐释，更重要的是探究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下，资本主义社会所面临的具体的危机形式，以及所采取的危机管制措施、资本积累体制、发展动力机制等。布兰德指出，“绿色经济”所倡议的“自然金融化”<sup>[5]</sup>措施，将会成为绿色资本主义设计框架内一系列危机管制的基础性轴心部分。

首先，处在经济和生态危机交汇处的“绿色经济”，将通过自然的金融化以拓展新的逐利空间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矿物燃料稀缺、能源供应不足、全球性粮食短缺、气候变暖等，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主导的全球性市场体制内都可以成为新的投资领域；电动交通工具、农业燃料、节能产品、绿色技术和碳排放权等，都可以成为新型商品而帮助经济危机之后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完成

① 污水池意指地球上吸纳人类社会特殊污染物的生态系统，以二氧化碳为例，污水池代指森林和海洋。

② 参见 [http://www.unep.org/greeneconomy/Portals/88/documents/ger/GER\\_synthesis\\_zh.pdf](http://www.unep.org/greeneconomy/Portals/88/documents/ger/GER_synthesis_zh.pdf)。

新一轮的资本积累。即便是人类自身发展所造成的污水池(如森林、海洋等)匮乏或污染等人为性稀缺状况,也可以在抑制气候变暖等全球或地方性环境政策下成为新的投资契机。而且这一获利趋势,将随着中国、印度等新兴经济体对能源和排污空间需求的大幅度上升而更加明显。

此外,大量的绿色投资也在全球范围内创造了数以万计的工作机会。2012年,“联合国声明,如果绿色政策在促进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发挥正确作用,那么接下来的20年内,将在世界各地创造数千万份新的工作”。“研究显示,美国现在约有300万份绿色工作,分配在风能、能源效率等部门。在英国,这一数量接近100万,且在少数经济领域一直有新的工作机会产生。在西班牙,大约有50万人从事绿色工作。同样,在发展中国家这一数字也在上升。在巴西,全国人口的7%、大约300万人正处在绿色经济之中。”<sup>①</sup>可见,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一轮资本积累完全可以建立在绿色商品、绿色投资等生态危机所催生的“绿色”措施之上。但是这在空间上却是极度排斥性的,甚至是一种向不发达地区的危机转移。例如,为了完成欧盟《可再生能源指令》(Renewable Energy Directive)<sup>②</sup>——2020年各成员国交通能源消耗中的可再生能源份额必须达到10%,以降低欧洲的碳排放,致使全球对生物燃料的需求大幅度上升。而在世界第二大棕榈油(生物燃料的重要原材料)生产国印度尼西亚,最大的油棕榈耕地来自砍伐原始雨林后得到的土地。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绿色投资的背后,是因掠夺发展中国家贫困农民的土地而激发的社会冲突。但不可否认的是,“资本主义所寻求的、基于某种新的社会与自然关系(相比于从前彻底破坏性的社会自然关系是新的)的新型资本积累体制,正在已经停滞的金融主导的旧资本主义形态中发生,并正在努力克服当前深刻的多重性危机”<sup>[3]</sup>。

其次,对资源稀缺影响的预估和商品化策略,以及“自然金融化”,正结合而形成新的管控自然资源开采的方式。资本主义积极的绿色技术发展政策与科技的不断进步,带来了能源效率的提升与节能产品的热销,同时也诱发了对土地、农业部门等的投资。发达国家通过在世界各地购买、控制和使用土地,从当地的生物量中获取传统能源、高科技产品所需的贵金属元素和绿色能源所需的原材料等。值得指出的是,当前开放的世界性贸易市场和激烈的全球性竞争,促使北方发达国家集中于资源成本低、储量丰富的南半球第三世界国家,一种“新的资源榨取主义”<sup>[6]</sup>(Neo-resource Extractivism)正在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中形成。“新的资源榨取主义”这一概念旨在阐明,当前拉丁美洲经济增长的强劲势态主要依赖于初级商品(如原材料、自然资源)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且剩余收入将直接用于改善贫穷与大部分人的物质生活水平。这似乎已经成为拉丁美洲部分国家缓解贫困的唯一可行的发展途径,其结果则是南半球许多国家的“去工业化”,比如当前墨西哥的大部分经济发展动力源自矿业开采部门。

此外,技术革新也催生了对太阳能、风能等新型能源的使用和对传统能源的“非传统”获取方式,如从深海油田中获取燃料和煤气,用水力破碎的方式从古老的页岩层中攫取天然气等。总之,化石燃料已不像20世纪70年代所预测的那样紧缺,且随着能源价格的上涨,资源开采与节能产品开发所带来的收益将会持续上升,反过来将会进一步刺激对相关领域的投资。因此,布兰德认为,将生物圈稀缺作为导致资本主义难以为继的一个难题是不准确的。在资本主义背景下,稀缺及其相关影响可以被主导性政治和经济团体所制定与强制执行的各种国家或国际层面的支配性或抑制性措施所管控,并在时空上外化。

北半球资本主义发达国家还借助于市场之外的政治军事力量与当前极不平衡的寡头政治结构,将资源密集型生产和消费所带来的生态负担在时间、空间上进行推延和转移——将“棕色产业”转

① 参见 <http://www.theguardian.com/environment/2012/may/31/switching-green-economy-jobs-un>。

② 参见 <https://ec.europa.eu/energy/en/topics/renewable-energy/renewable-energy-directive>。

移到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或地区，并将污染物运往中国、越南、东欧或非洲，而在本国进行一定程度上的“绿色调整”。例如，许多西方国家因不愿承担高昂的回收处理费用而将电子垃圾非法运往非洲贫困国家或中国境内进行处理。其中一些有毒材料如铅、汞、砷等，严重危害了当地的生态环境和居民健康。中国现在已经变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垃圾倾倒地。2013年，据联合国数据显示，全球产生的约70%的电子垃圾最终流向中国。大部分电子垃圾的入境渠道是非法的，因为根据联合国有关公约规定，明确禁止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向中国和越南这样的国家转移电子垃圾<sup>①</sup>。与此类似，非洲加纳阿克拉市的边郊城镇阿博布罗西（Agbogbloshie）<sup>②</sup>被称为“数字填埋场”，每年有数百万吨合法或非法出口的电子垃圾在这儿被处理。

与资本主义国家生态负担外部化原则相伴随的，是一种吸引力日渐增强的发达国家所主导的“帝国式生活方式”（Imperial Mode of Living）<sup>[7][8]</sup>，正如毛细血管般在世界范围内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迅速扩散。北半球发达国家占据统治地位的生产和消费模式依托于具体的营销手段，通过世界市场在南方国家或新兴经济体的中高社会阶层人群中迅速传播。尽管这种生活方式因为发展水平、购买能力和对“好生活”的定义不同而在各个国家和地区呈现出极大的不平等性或相异的表现形式，但维系“好生活”所需的对第三世界国家或地区的土地、资源、廉价劳动力、污水池等的“帝国式”占有却是一致的。这种西方发达国家生产、生活方式的泛化，必然会造成国家之间在资源获取与“污水池”使用方面的冲突，但发达国家仍能依靠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及内嵌于国际制度中的不平等关系在不平衡的国际生态秩序中保持着“霸权”地位。

总之，不管是“绿色经济”所推动的“绿色资本主义”转型，还是正在全球流行的“帝国式生活方式”，都具有社会和空间上的极度排他性特点。更确切地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必须通过政治、军事或相关和约的力量压制和排斥南半球的新来者，甚至以牺牲其他地区的生态环境与社会发展为代价，保证其“转型”和生产生活方式的正常进行。但在当前这一特定的历史时间段，资本主义社会的确能够以一系列有效的措施来重新组织其对自然的占用，以保证其生产与生活方式的继续。或者说，在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深陷多重危机之后，一场试图修复资本主义发展动力机制与维系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关系和社会—自然关系稳定的，由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和社会精英等统治力量所主导的“绿色资本主义”社会转型的确已经发生，生态和经济危机暂时并不构成对资本主义基本结构和发展动力机制的否定。但布兰德也同样指出，管制并不意味着破坏性占用的倾向与霸权性统治规则的终结。它只是将危机所带来的灾难推延到未来或外化到其他地区，以缓和生态退化对整个资本主义发展所造成的阻碍。

## 二、“绿色资本主义”与“被动革命”

在布兰德看来，马克思的基本看法是，资本主义是一种由资本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欲望所驱动的不断变化的社会形态。“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却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震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sup>[9](P469)</sup>依此而言，积累原则对社会的“转型”或变化本身，便有着根本性的深远影响。换句话说，资本主义本身就具有不断“革新”的天性。资本主义另一个与“革新”相关的趋势，是对世界性市场的拓展。资本主义生产方

<sup>①</sup> 参见 <http://edition.cnn.com/2013/05/30/world/asia/china-electronic-waste-e-waste/index.html> hpt=ias\_c1。

<sup>②</sup> 参见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8D%9A%E5%B8%83%E7%BE%85%E8%A5%BF>。

式下“不断扩大的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市场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sup>[10](P61)</sup>。

因此，从古典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一术语，对社会发展过程中复杂多变的社会关系并无详尽说明，而且资本主义的发展本身就是建立在时间、空间、资源、财富的极度不平衡之上，它同自然的关系也是破坏性的——“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sup>[11](P134)</sup>。换句话说，资本主义在本质上便是倾向于危机的。在这里，布兰德试图说明，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系其生存与发展，改变或者某种程度的“转型”将会持续发生，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转型”背后的主导性逻辑是什么。

纵观目前大部分关于“绿色经济”或“生态现代化”的讨论与研究，几乎没有任何关于亟待治理的难题与危机的真实社会内涵的界定。相反，分析总是集中在过度开采的能源和污水池，尤其是过度排放二氧化碳所引起的大气污染。可见，“绿色经济”只是集中于改造资本主义的能源基础和产生污染的制造业，而并非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体制及其庇护下的与社会统治密不可分的资本积累原则、破坏性社会—自然关系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所以，精英统治下的社会权力结构和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惜一切代价实现经济增长的社会发展导向与增长逻辑并未被触及。“绿色经济”在大部分表述中意味着“绿色增长”，其政策往往同经济利益和工作雇佣相一致。“自然金融化”或“商品化”等策略，在某种程度上是资本主义国家或国际性组织所主导的，是维系当前霸权性社会结构和不平等的日常生产生活秩序的“被动性革命”战略的一部分。

在布兰德看来，这样一种发展或转型可以用葛兰西的“被动革命”概念来形容。“被动革命”意味着解决危机的措施不允许破坏资本主义发展模式的基本先决条件与它所依赖的社会权力关系。“被动性元素是指将从属部分的利益融入其中，但却仍将其维持从属位置。在将从属集团的知识分子和领导者们吸收进权力集团的同时，剥夺他们对从属集团的领导权……权力集团的决定性职责不是消除或解决矛盾，而是管制矛盾并将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因此，这样的霸权概念并不是谋求某种秩序的稳定，而只是解决冲突与矛盾的方式。”<sup>①</sup>一场成功的“被动革命”，可以调整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而使其成为新的霸权计划的一部分，“绿色经济”所促成的“绿色资本主义”便与此类似。但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被动革命”，不是社会进步所带来的自动调整，而是人为的、部分的、有选择性的调整，并不必然改善大多数民众的生活条件。

正如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的富裕建立在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之上，“绿色资本主义”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一个暂时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其“转型逻辑”是由统治阶层所主导的，在不触及社会权力结构和社会统治关系的前提下，意图通过生态代价外部化、自然金融化、能源绿色化等手段以改变资本主义工业基础的一种选择性、排他性“绿化”。可以肯定的是，这种有限性的、排他性的、并未触及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体制与破坏性社会—自然关系的“社会生态转型”，远非消除当前全球性生态难题的根本措施。

### 三、作为一个批判性分析框架的“社会生态转型”

布兰德认为，“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个批判性分析框架，将面临着双重挑战。一是对国家管控或危机管制的认知。如前文所述，当前亟待解决的社会生态难题，受到了社会统治力量的主导，并具有霸权性和危机驱动的特征。规制理论、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霸权理论的引入，有助于对当前

<sup>①</sup> 参见 Mario Candeias, *Passive Revolutions vs.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Background paper for the Commons-Conference in Rome, 28/29 April 2011, organized by Rosa Luxemburg Foundation Brussels.

的支配性政治实践与霸权式生产生活方式的批判性分析，以及“绿色资本主义”的帝国式、排斥性、新殖民主义特征的解读。另一个挑战是“控制客体”的概念化，即社会生态转型过程中变革对象的概念化。这里的“客体”并非自然科学所描述的处在危机之中的全球性生态系统，而是不可触摸的各种复杂的社会支配方式、社会自然关系等。布兰德认为，这可以借助于批判性政治生态学的分析，它对“社会—自然关系”的分析和对各种社会统治形式的激进性批判，使我们对转型“客体”有着更深刻的理解。

政治生态学在北美的学术研究中是自然社会地理学的一种主要形式，但在英国以及欧洲大陆地区还基本处于边缘地位。经过近些年的学术探究和政治实践，政治生态学已获得了迅速发展，其议题也日渐多元。现在，这一术语主要应用于围绕人类社会与非人自然之间的关系问题所展开的广泛关切。在认识论层面上，政治生态学致力于粉碎人类社会和它的自然环境之间过分简化的“事实”<sup>[12](P4)</sup>，而批判性再思考自然和社会—自然关系。

当前，不同流派或方法下的政治生态学研究有着以下几点共性：首先，吸纳社会批判性理论和以一种后实证主义的方式理解自然和有关自然的知识生产，并将这些视作无法脱离社会权力关系的存在。许多政治生态学研究具有理论上的普遍性，它们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并经常受到后结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女性地理学的影响。因此，政治生态学同激进的学术研究取向密切相关，拒绝以实证主义的方式理解社会关系和环境科学。其次，政治生态学坚信在社会—自然关系中存在着无法通过社会或空间距离，比如通过遥感、普查、采集沙样或水样等方法解读的关键因素，而只能通过集体的、开放式的、定性的方法（大部分情况下是综合的）所确定。因此，政治生态学在方法论层面上具有多重性，其大部分研究将定性分析、广泛的民族志研究如访谈与直接调查和历史文献分析等方法相结合，并经常使用定量分析（如使用地理信息系统）、勘察法和一系列生态科学中常用的手段。第三，就政治层面而言，同马克思所讲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sup>[10](P61)</sup>相一致，政治生态学有着明确的价值规范，它从一开始就强调斗争、利益和处在边缘地位的民众（农民、原住民、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派、女性、穷人）的疾苦。因此，政治生态学不仅仅解释社会和环境的进程，更侧重于社会正义和激进政治，以构建另一种理解社会和自然相互影响的方式<sup>[12](P6)</sup>。

因此，政治生态学视野下的自然，并非只是自然科学所描述的“星球”，而生态关切也不仅仅是对资源或污水池稀缺和气候变化的关注。自然的物质性可以被科学、经验等方式所认知并作用于社会进程的同时，也由社会实践，如科学技术、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制度等所建构。因此，当反思当前特定的、历史的、霸权性的、区域性不平等的自然占用方式时，考察的关键不应是“环境”、“环境空间”或“星球边界”，而是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的帝国主义的、父权式的、破坏性的占有。更确切地说，应该是资本主义利益和权力统治支配下，满足衣食住行、健康、生育等社会基本需求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危机实质是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的危机，是化石燃料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帝国式发展模式所不曾预想到的结果。

可见，在政治生态学基础上所建构的批判性“社会生态转型”框架，是以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生态批判为起点。本质上由劳动来调节的人类社会与非人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呈现出一种特殊样态：使用价值受制于交换价值；资本、雇佣劳动以及其他劳动形式之间产生劳动等级划分；形成与资本主义经济和阶级关系相分离的现代国家。人类社会中的“自然殖民化”趋势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主导的社会形态内同强大的商品化趋势相连续<sup>①</sup>。自世界进入工业资本

① 参见 Ulrich Brand. How to get out of the multiple crisis: Contours of a critical theory of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The theory of regulation in times of crises”, Paris, June 10-12, 2015.

主义时代以来,资本主义国家便以对自然的破坏性占有作为维系其帝国式生产生活方式与国家和社会关系、社会—自然关系稳定的基础与代价,比如在福特主义时代。同时,国家政策和自由市场等政治经济体制,又反过来确保这种破坏性占用自然方式的持续,或者说,以此为基础的生产生活方式的继续。

在布兰德看来,自然科学对生态危机如资源短缺、环境退化、全球变暖等问题的分析性描述与政治精英所构想的绿色技术、绿色经济等战略性应对,往往忽略了自然与社会之间相互影响的“共构性”特征与内嵌于霸权式的社会统治形式与发展动力机制之中的人与人之间、社会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尽管前者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所谓的“绿色”,但后者才是转型的“客体”与关键。因此,“社会生态转型”作为一种绿色左翼认知与战略框架,应着眼于分析和批判当前庇护破坏性社会—自然关系与统治性社会关系的复杂的社会统治形式,也就是,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并在更具体层面上提出“深植于具体改革”、但又能够“使消极革命意义上的危机管制措施无效化”的进步性替代方案。

综上所述,“社会生态转型”既可以作为一个分析性概念对当前占据主流地位的“绿色经济”话语下的一系列生态危机应对措施做出概括性描述,阐明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管制之下,生态危机所造成的影响正外化于其他地区或被推延于未来,而破坏性占用自然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并未得到根除;又能够从批判或规范性层面揭示其背后所隐含的严重不平等性、排斥性、选择性与阶段性特点,揭示当前绿色左翼“转型”的关键在于彻底地批判与变革资本主义复杂的社会统治形式。

在布兰德的“社会生态转型”研究中,他对霸权理论、唯物主义国家理论、被动革命等的应用,使其关注点更多聚焦于资本主义社会统治形式和国家管制手段或调适能力等这类具体层面的分析。他对“绿色资本主义”积累体制与规制手段的分析与批判,比较客观地揭示出当前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面对生态与经济危机时所具备的应对能力和以牺牲其他国家或地区为代价的霸权性战略。应该说,这也是以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作为分析重点的传统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所忽视的地方。但是,他对于危机管制措施及其成效的过度强调,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淡化资本主义与自然根本性矛盾的风险。

如果按照任何一种解放性社会科学都将面临三项基本任务——对现存世界的系统性诊断和批判、设想可行的替代路径、理解转型的障碍、可能性和困境<sup>[13](P7)</sup>——的标准,布兰德所阐发的“社会生态转型”目前还仍是处于第一层面,即对当前资本主义所引领的“绿色”潮流的系统性诊断和批判,还远未构成一种与当今世界“绿色资本主义”全球性扩展相抗衡的理论或运动。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生态转型”在更多情况下是作为一种分析与反思当前有关“转型”实践与讨论的框架来使用,仍处于进一步的拓展与完善之中。

#### 参考文献

- [1] Brand, U., M. Wissen. Social-ecological transformations[A]. N. Castree, M. Goodchild, W. D. Liu, etc.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Geography: People, the Earth, Environment, and Technology*[C]. Hoboken: Wiley-Blackwell/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I. E.), 2015.
- [2] Brand, U. Green economy—The next oxymoron no lessons learned from failures of implem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J]. *GAIA*, 2012, (1).
- [3] Brand, U., M. Wissen. Strategies of a green economy, contours of a green capitalism[A]. Van Der Pijl, Kees (ed.).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of Production. Handbooks of Research 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Series*[C].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5.

- [4] Brand, U. Post-fordist hybridization, a historical-materialist approach to two modes of state transformation [A]. L. Ronnie, H. Shelley (eds.). *Hybrid Rule and State Formation: Public-private Power in the 21st Century* (RIPE Series in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C]. London: Routledge, 2015.
- [5] Brand, U., M. Wissen. The financialisation of nature as crisis strategy[J]. *Journal fur Entwicklungspolitik*, 2014, (2).
- [6] Brand, U. Neo-extractivism in Latin America—One side of a new phase of global capitalist dynamics[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2015.
- [7] Brand, U., M. Wissen.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and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rticulations of state-capital relations in the multiple crisis[J]. *Globalizations*, 2012, (4).
- [8] Brand, U., M. Wissen. Crisis and continuity of capitalist society-nature relationship: The imperial mode of living and the limits to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2013, (4).
- [9]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63.
- [10]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5.
- [1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9.
- [12] Perreault, T., G. Bridge, J. McCarthy.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Political Ecology*[M]. London: Routledge, 2015.
- [13] Wright, E. O. *Envisioning Real Utopias*[M]. London: Verso, 2010.

(责任编辑 周振新)